

东方巨人

毛泽东

EASTERN GREAT EMINENCE
MAO ZE DONG
解放军出版社 主编 李捷 于俊道
DONGFANGJURENMAOZEDONG

8卷

东方巨人毛泽东

(第八卷)

主 编 李 捷 于俊道

解 放 军 出 版 社

京新登字 117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方巨人毛泽东/李捷,于俊道主编. -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6

ISBN 7-5065-3373-1

I. 东… II. ①李… ②于… III. 毛泽东-生平事迹-回忆录 IV. A752

书名:东方巨人毛泽东(八卷本)

著者: 李捷 于俊道 主编

出版者: 解放军出版社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邮政编码 100035]

排版者: 北京强利世纪科技发展中心

印刷者: 北京建筑工业印刷厂

发行者: 解放军出版社发行部

经销者: 新华书店

开本: B5

印张: 197.5

插页: 48

字数: 2133 千

版次: 2001 年 9 月第 2 版

印次: 2001 年 9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印数: 3000 册

书号: ISBN 7-5065-3373 - 1/D·391

定价: 880.00 元(全八卷)

主 编：李 捷 于俊道

副主编：毛国强 王红续 孙 刚

编 委：李 捷 于俊道 毛国强 王红续
孙 刚 龙润霞 王彩琴

编务工作人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 刚	丁子明	力 玉	力 威
大 鹏	巴 凤	王 岚	王成秀
方维钢	正 龙	汉 桥	叶绩辉
齐 芝	江 平	全 道	刘 畅
刘京明	刘前明	秀 芳	学 清
杨 铭	吴振山	肖 文	肖 坤
肖 娟	邹 洋	匡琼德	张国秀
张丽英	苑彦艳	尚 道	周之士
周意人	周嘉琪	胡少玉	欧 阳
闻 辉	俞 晔	梁旺芝	梁晓村
恩 阳	菊 华	道 珍	董玉君
静 静	鹏 程		

目 录

(第八卷)

第八编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一、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失误…………… (3)

炮打“司令部”…………… (3)

“天下大乱”…………… (37)

全面夺权…………… (54)

中共“九大”…………… (108)

二、惊心动魄的斗争…………… (120)

“大有炸平庐山之势”…………… (120)

批陈整风…………… (134)

“弹指一挥间”…………… (141)

三、开创外交新格局…………… (176)

国际形势座谈会…………… (176)

与尼克松握手 (191)

“不要强加于人” (218)

四、重病的日子里 (226)

出席陈毅追悼会 (226)

“组阁”风波 (239)

支持邓小平工作 (247)

最后的抉择 (254)

病逝北京 (269)

附录

毛泽东生平大事年表

(1893—1976) (284)

第 八 编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一、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失误

炮打“司令部”

“文化大革命”，被毛泽东视为一生做过的两件大事之一。1967年2月，他在会见外宾时说：“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露我们的黑暗面。”这概括了他自1962年夏季以来的主要思索过程。

毛泽东的主观意图，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同时也含有对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状况及社会阶级斗争状况的错误观察（这是主要的）。然而，实践证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依据及其实践，都是错误的。离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脱离社会主义法制这个根本手段，去搞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清除腐败现象，只能给党和国家带来无休止的动乱。这是沉痛的历史教训，也是毛泽东晚年的一大悲剧。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集中体现在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通知》上。当时，毛泽东正在杭州，没有出席会议，但他自始至终亲自主持制定了这个通知。

《通知》开头几段是针对《二月提纲》的，并且说：“所谓‘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实际上只是彭真一个人的汇报提纲”。“彭真根本没有在‘五人小组’内讨论过、商量过”，“更没有得到中央主席毛泽东同志的同意”。而且上纲说：“这个提纲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来看待当前学术批判的形势和性质，根本颠倒了敌我关系。”

关于《五·一六通知》的酝酿和起草过程，穆欣回忆说：

3月17日至20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专门就学术批判问题讲了话。讲话中指出：要用5年到10年的工夫，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不能指望那些老教授，要培养我们的年轻的学术权威。不要怕年轻人犯“王法”，不要扣压他们的稿件。中宣部不要成为“农村工作部”。现在，全国只有15个省市参加批判吴晗，还有13个省、市也要动起来。各地都要注意学校、报纸、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手里。我们在解放以后，对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分子掌握了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目的。吴晗、翦伯赞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有些共产党员也反共，搞的是修正主义。他们培养的人也要搞修正主义。现在许多地方对于这个问题认识还很差，学术批判还没有开展起来。

3月28至30日，毛泽东在杭州3次同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谈话，严厉指责北京市委、中央宣传部包庇坏人，不支持左派。说：北京市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要解散市委；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说吴晗、翦伯赞是学阀，上面还有包庇他们的大党阀（指彭真），并点名批评邓拓、吴晗、廖沫沙担任写稿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写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毛泽东还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说各地应多出一些孙悟空，大闹天宫。毛泽东这一谈话，预示着“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日益逼近。

4月9日至12日，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传达、讨论了毛泽东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会议决定：一、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二月提纲》的错误。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报毛泽东和政治局常委批准。

4月15日，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的成员全部到达上海，住在锦江饭店南楼。就当时的条件而言，算是相当阔绰的宾馆。这天由陈伯达在饭店召开第一次会议，宣布了4月9日至1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成立的文化革命起草小组名单（根据当时的笔记本：是从印出的名单记录的）：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刘志坚，组员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吴冷西，陈亚丁、尹达、张春桥。（其后，中共中央于5月28日发出《关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的通知》说：“中央决定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领导下。现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通知你们：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通知》还说：“华北、

东北、西北、西南四大区参加的成员〔4人〕确定后，另行通知。”8月2日，中央通知：陶铸兼任顾问；8月30日，中央通知由第一副组长代理组长、四大区确定的成员为：华北郭影秋、东北郑季翘、西北杨植霖、西南刘文珍。至1967年8月，陶铸、王任重、刘志坚、谢镗忠、尹达、穆欣等人受到迫害都离开了这个小组，而四大区的成员只在初期参加过中央文革小组的几次会议，先后在各地受到迫害和批斗。）

《通知》的草稿早在北京已经写出并已印出。这个文件是4月初旬陈伯达和王力“关起门来制造”出来的，对原先的五人小组绝对保密。《通知》之外，根据康生的意见，适应他在政治上的需要，由他主持还编造了一份《1965年9月到1966年5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作为《通知》的附件。康生提出编造《大事记》的意图时说：“错误不能人人有份”，他就利用这个《大事记》去讲在《通知》中不便讲的话，来为自己的错误开脱。将错误推给别人，把功劳留给自己。通过《通知》和《大事记》，把自己洗刷得干干净净。《大事记》的记述背离实事求是的原则，许多地方牵强附会，无限上纲；或者指鹿为马，是非颠倒。

4月16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等问题。

从4月14日到18日，毛泽东对《通知》草稿作过多次修改，增添了许多尖锐的词句。这些经他修改、增添的地方，有些印件都用黑体字标示出来了。4月24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基本上通过了这个《通知》的草稿，决定提交将于北京召

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4月28日，毛泽东同康生、陈伯达谈道：“你们写了《通知》，我逐次的增加，加油加醋。……”

毛泽东的修改稿，有的是在杭州修改后交陈伯达、康生带回或派人送来上海的，有些是由秘书徐业夫用电话从杭州传到上海来的。根据笔者当时未必完整的记载，几次修改的情况是：

4月14日修改的地方主要是第9段和文件末尾部分。第9段增加两处，一处说“绝大多数党委对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一处是指责五人小组：“他们对于一切牛鬼蛇神却放手让其出笼，多年来塞满了我们的报纸、广播、刊物、书籍、教科书、讲演、文艺作品、电影、戏剧、曲艺、美术、音乐、舞蹈等等，从不提倡要受无产阶级的领导，从来也不要批准，……”文件末尾倒数第2、3段，几乎全是毛泽东添加的。其中最令人震惊的，是说“混进”来的“资产阶级人物”有的还未识破，有的仍在信用，被培养为“接班人”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的身旁”这句话，不仅使人震惊，同时引起种种猜想。就连康生也说：“林总（指林彪）叫这一段是惊心动魄的一段。”——不过起初人们还猜不到刘少奇身上。

4月17日修改的是第1段和第3段中的3处。第1段增添的是批评《二月提纲》“（特别是模糊了这场大斗争的目的是对）吴晗及其他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批判。”第3段增添两处，前面是引毛泽东

说的强调思想战线要进行“长期的斗争”和“放”；后者是在同资产阶级“根本谈不上什么平等”之后直至这段末尾的一大段话。

4月18日增添的是第7段一句话。毛泽东添加的原话比较简单：“那些钻进党内保护资产阶级学阀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才是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阀。”经过康生和陈伯达“加油加醋”，结果变成了后来完全用黑体字排出的这样的长句：“其实，那些支持资产阶级学阀的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钻进党内保护资产阶级学阀的代表人物，才是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什么学问也没有、专靠‘武断和以势压人’、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阀。”其中的“不读书、不看报、什么学问也没有”的话，暴露出这两个“理论权威”以“大学问家”自诩的心态，以后成为“大批判中”不分对象胡乱指责“走资派”的口头禅、套话。

还有未见用黑体字排印过的《通知》最末一段，是毛泽东于4月17日添加的：“这个通知，可以连同中央今年2月12日发出的错误文件，发到县委、文化机关党委和军队团级党委，请他们展开讨论，究竟哪一个文件是错误的，哪一个文件是正确的，他们自己的认识如何，有哪些成绩，有哪些错误。”关于这一点，联系《通知》这个文件的名称，康生5月5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发言时说：“《通知》可以议一下。可以说原《提纲》是对的，《通知》是不对的。顺便解释一下：这么重要的一个文件，叫《通知》好不好？我同伯达考虑过。少奇同志和陈总等都考虑过。问主席，主席讲还是叫《通知》。他没有解释，但他反复讲过，要大家议论：两个文件，哪一个

对的，哪一个是错的。22日会上，主席讲可以允许推翻《通知》，赞同彭真的文件。允许讲彭真那一套是对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可能是主席考虑，大家不容易一下子认识问题的严重性。这样，更容易使大家发表意见。”实际上，这时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已发展到十分严重的程度。几乎全党对毛泽东都有个人崇拜，上层也只有少数例外。就在通过这个《通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林彪5月18日讲话时就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以后不久，林彪又在中央工作会议说：“我们对主席的指示要坚决执行，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要执行。”对于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通知》，还有谁能说它“是不对的”、谁敢“推翻”呢？所以5月16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这个《通知》没有进行认真的讨论就通过了。

历史的实践已对这个问题作出正确的回答。《通知》从批判《二月提纲》入手，提出在文化领域各界和党、政、军各个领域都混进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问题。它对《二月提纲》作了种种歪曲和指责，说提纲掩盖了这场学术批判的“严重的政治性质”，是“为资产阶级复辟作准备”的修正主义纲领。它还根据党、政、军都混进了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估计，发出将要出现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警号。“这个通知集中反映了毛泽东对当时党和国家政治形势的严重错误估计。”〔1〕

4月2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基本上通过了《通知》草稿后，起草文件的工作告一段落。4月30日，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成员大都离开上海，飞回北京（只江青、张春桥留在上海）。〔2〕

在彭真等人受到严厉指责的同时，刘少奇也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黄峥在《刘少奇与“文化大革命”》一文中认为，此时的刘少奇是在缺乏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被迫推上运动的第一线的。他写道：

1965年11月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的发表以及随之而来的在文学艺术领域里的批判运动，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展开的序幕。现在看得很清楚，“文化大革命”一剧中的许多情节和人物活动，包括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的某些意图，都已经在这场序幕里显露端倪。由于种种原因，刘少奇对这场序幕中的许多主要事件却不知情。

1965年，江青在上海与张春桥秘密策划，由姚文元执笔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并且得到毛泽东的支持。这篇文章从写作到发表，刘少奇一无所知。

1966年2月2日至20日，江青与林彪互相勾结，由江青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宣称建国以来文艺界被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政。此中内情，刘少奇无从知晓。

1966年2月3日，彭真召集“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会议，会后起草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试图限制当时的过火倾向。2月5日刘少奇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听取汇报后表示同意。这个提纲在彭真等专程去武汉向毛泽东报告之后，在刘少奇、邓小平支持下于2月12日作为中共中央文件批发全党。《二月提纲》的发出，算是刘少奇在“文化大革命”序幕期间唯一了解和经手的大事。但不久此事又发生突变。

1966年3月25日至4月20日，刘少奇出访巴基斯坦、阿

富汗、缅甸。就在这近1个月时间里，国内发生了一系列重要事情：

1966年3月底，毛泽东在上海几次同康生等人谈话，说《二月提纲》是错误的，指责北京市委、中宣部不支持“左派”，是“阎王殿”，并严厉批评说：“再不支持，就解散五人小组、中央宣传部、北京市委。”毛泽东还提倡各地应多出一些大闹天宫的孙悟空，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毛泽东的谈话，不但是针对彭真、陆定一的，同时表明毛泽东下决心要发动一场清算中央内部的“修正主义”的“革命”。

4月上旬，林彪、江青合伙搞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经过毛泽东审阅修改，作为中共中央文件批发全党。其中说：“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与此同时康生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几次谈话的内容。在会上，康生和陈伯达一起批判彭真在批《海瑞罢官》以来的所谓错误和“一系列罪行”。会议决定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批判《二月提纲》。4月16日，毛泽东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用林彪的说法，“集中解决彭真的问题，揭了盖子。”

在此期间，由陈伯达、康生、江青等组成的“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在毛泽东主持下，加紧起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后来的《五·一六通知》），除点名批判彭真外，宣布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直属政治局常委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这样，等到刘少奇出访回国，摆在他面前的既成事实是：彭真已经打倒，《五·一六通知》已经定稿，“中央文革小组”